

美国民主党与奴隶制的关系初探

——兼议民主党的性质

王 锦 塘

在美国近代史上,民主党和奴隶制的关系是一个重要问题。它不仅关系到民主党本身的发展与演变,还涉及美国内战的政治经济背景,涉及对美国内战前各届政府的内外政策的评价。对于民主党的性质及其演变过程,国内外史学界历来众说纷纭。小阿瑟·施莱辛格主编的《美国政党史》认为,“1828年到1860年间的民主党,是一个由具有不同利害关系的人们所组成的变动不定的联盟”^①。福斯特则笼统地称民主党为奴隶主的党^②。苏联的美国史学者主张,“及杰克逊总统退职后,该党的领导地位全部为南部的种植园主所攫取,而民主党乃成为奴隶主的党。”^③国内则有人认为,直到波尔克时代,“民主党还是西部农民和南部种植园主的政治联盟”,“只是到了50年代,民主党才逐渐蜕变为南部奴隶主的党,代表南部奴隶主而控制中央政权”^④。上述各类观点有的含义不清,有的把民主党的蜕变说得过早,有的则把其蜕变时间过分推迟,笔者不敢苟同。本文试图结合美国民主党发展与演变的过程,对民主党和奴隶制的关系作初步探讨。

民主党的发展和演变

民主党从1828年成立起至1860年止,一直在美国政治舞台上占居统治地位。它控制总统职位和参议院达24年,最高法院26年,众议院23年^⑤。在这期间,除开8年由辉格党人担任总统外,其余时间是民主党的一统天下。

民主党并非一开始就是奴隶主的党,而是不同阶级的政治联盟。也不是如有些人所说的那样,“从杰克逊总统退职后……民主党乃成为奴隶主的党”^⑥,它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当然,我也不同意有人以为的,“只是到了50年代民主党才逐渐蜕变成南部奴隶主的党,代表南部奴隶主而控制中央政权”^⑦。至于杰克逊的追随者把民主党美化成人民利益的代表者更是无稽之谈。

判断一个政党的性质,不是看它由什么成份组成,也不能根据它宣扬和标榜什么,而要看它主要代表了哪些阶级的利益,为哪个阶级所操纵,执行了主要有利于谁的政策。根据这些原则,我们把民主党的发展演变过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杰克逊和范布伦总统时期为第一阶段(1828—1841);波尔克总统时期为第二阶段(1845—1849);皮尔斯和布坎南执政时期为第三阶段(1853—1861)。

第一阶段为民主党的初创时期。这个时期的民主党是由不同阶级和派别(西部和南部奴隶主、西部边疆农民、城市贫民和部分工商业集团)所组成的政治联盟。奴隶主是其中重要

势力，但还不是左右政权的力量，笼统地讲民主党是奴隶主的党是不恰当的。因为，这时它所执行的各项政策更多的是从全国利益出发的，既照顾到南北双方剥削阶级（工商业资产阶级和奴隶主）的利益，同时在客观上也反映了广大群众的愿望。如杰克逊总统任内所进行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顺应了社会经济发展要求，维护了中央集权，加强了资产阶级专政，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中、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权利，对于促进美国早期的资本主义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杰克逊反对分裂，维护联邦权力的几次果敢行动，历来为世人所称道。一次是1828年，当南卡罗来纳的奴隶主势力在卡尔霍恩的纵容下，通过国会法令废止权，企图煽动分裂，削弱和破坏联邦权力时，杰克逊采取恩威并用的手段，迅速平定了南卡罗来纳带头策动的分裂阴谋，维护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巩固了联邦的统一，给奴隶制的维护者予以迎头痛击。“表明他是一个反对州权的坚定的国家主义捍卫者”^⑥。另一次是在1830年，当副总统卡尔霍恩和南卡罗来纳参议员、奴隶制的辩护士海恩之流，重弹“州权至上”的滥调，并定计拉杰克逊总统下水支持他们时，杰克逊以整个国家利益为重，当众揭穿了他们的阴谋，再次制止了分裂联邦的危机，维护了联邦的权威。在这次纪念杰斐逊诞辰的宴会上，卡尔霍恩精心安排，祝酒词都经过事先修改。在经过24次干杯表示支持州权以后，奴隶主们期望着总统表态。杰克逊站起来，严厉瞪着卡尔霍恩，举起酒杯祝酒说，“我们的联邦一定要维护！”一位目击者报道说，“即使下令将卡尔霍恩当场逮捕，也不会比这祝酒词更令人目眩，更令人吃惊了”。^⑦杰克逊的这次行动使他在北部和西部新兴资产阶级以及一般人民心目中获得了好感。其主要原因显然在于他维护了国家民族的利益，打击了奴隶主分裂势力。杰克逊反对东部大资本家和英国操纵的金融工具—第二合众国银行的斗争，在客观上也适应了工、农和小资产阶级的要求，具有为美国资本主义独立发展而斗争的趋向。正是由于杰克逊的政策基本上符合当时美国社会发展要求，所以他能够“坐天下”达8年之久，以他的姓氏为牌号的那种民主（即杰克逊民主）获得了许多美国人的赞赏。

范布伦当选总统后，民主党基本上继续推行杰克逊的政策。他力图在废奴主义者和奴隶制拥护者之间执行“中间路线”，千方百计保持南北联盟，调和民主党内部分歧，以巩固资产阶级和奴隶主的联合专政。他甚至反对匆忙合并得克萨斯，以避免和墨西哥交战。总之，范布伦政府所执行的政策基本上还是从全国利益出发的，他没有屈服于奴隶主势力，没有使联邦政权成为奴隶主利益的工具。民主党还是上述各阶级的政治联盟。

但必须指出的是，“从民主党成立的时候起，党内重要的派别就决心用维护州权的理论来保护蓄奴制”^⑧。上述卡尔霍恩的多次发难就是例证。到了30年代以后，“南部（奴隶主）势力对国家政策的明显影响增加了”^⑨。民主党在蓄奴制问题上“越来越倾向于亲南部的立场”^⑩。如杰克逊政府的邮政部长阿莫斯·肯德尔屈服于奴隶主的压力，于1835年非正式地命令南部各邮政局局长没收废奴派的宣传印刷品，杰克逊也亲自要求国会禁止将这类印刷品通过邮局寄出去，并最后制定一条法律。杰克逊对西部印第安人的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奴隶主扩展奴隶制领域的要求。

经过两届辉格党执政以后，民主党人波尔克当选为总统，开始了民主党发展的第二阶段（1845—1849）。这时，民主党已开始由主要是西部农民和南部种植园主以及与奴隶制有密切联系的北方部分资产阶级的政治联盟逐渐演变为南部奴隶主利益的工具。

我们不妨来分析一下波尔克总统任期间所执行的政策究竟对准更有利。波尔克在刚刚宣誓就职后曾对历史学家乔治·般克罗夫特说，“我的政府将采取四大措施。一是降低关税；二是实行独立的财政制度；三是解决俄勒冈边界问题；最后一条是取得加利福尼亚。”^⑪众所

可知，从当时美国经济发展总的利益来看，显然需要实行保护关税政策，这样才能抵制欧洲尤其是英国产品的倾销，促进民族工业的迅速发展。相反，自由贸易是不利于美国工业发展的。南部奴隶制种植园的棉花，主要销往英国市场，以换取廉价工业品。因此，南部奴隶主长期以来一直主张自由贸易政策。波尔克政府降低关税正好适应了奴隶主的需要。至于合并俄勒冈和侵占加利福尼亚主要迎合了南部奴隶主扩张奴隶制的要求。1844年民主党竞选纲领正式提出“在尽可能早的时间内重新占领俄勒冈和归并得克萨斯”^⑭。因为波尔克牢牢地控制了他的内阁和国会中的民主党人，所以在他任职结束时，实现了他提出的所有四项目标。奴隶主们如愿以偿。难怪废奴派领袖弗里德里克·道格拉斯说，波尔克是“奴隶主总统”^⑮。《美国民主党史》作者之一迈克尔·F·霍尔特指出：“由于波尔克的背叛，范布伦派确信那可恶的蓄奴制势力控制了他的政府。1846年对墨西哥战争的爆发证实了这一看法。”^⑯由此可见，波尔克时代，南部奴隶主势力已控制了联邦政权。那么，南部奴隶主势力对民主党的控制又如何呢？这个时期，除波尔克是田纳西的奴隶主外，内阁中许多重要成员都是南部人，他们对民主党的纲领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正是上述作者进一步指出，“自1844年以来，南方人（即奴隶主势力）确已控制了这一全国性的政党”^⑰。可见，那种认为直到波尔克时代“民主党的内外政策更多是体现了全国的利益，而不是受南部利益的驱使”^⑱的说法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因而是站不住脚的。

说果说在早期阶段，民主党的亲奴隶主立场还只是一种倾向，在波尔克总统时期它已开始向奴隶主政党演变的话，那么，到了皮尔斯和布坎南当政时，民主党则完全成了奴隶主的工具，一个地地道道的奴隶主政党（尽管到这时为止，还有一部西部农民及一些北方工人继续留在党内）。

皮尔斯总统是来自新英格兰的北方民主党人，但他“差不多在任何问题上都向着南方”^⑲。他签署了奴隶主们拥护的较低的关税法；否决了一项有利于发展交通的内部改革法案；扼杀了移民所渴望的宅地法；特别是他批准了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从法律上扩大了奴隶制的地理界线，从而刺激了奴隶主的胃口，促使他们更加猖狂地向北部自由势力发动新进攻。皮尔斯总统刚刚签署了这一法案，就有大批奴隶主和边境暴徒冲进堪萨斯，占据了大片最好的土地，建立了几个奴隶主据点。为了反对奴隶主势力的扩张活动，自由移民也大量开进堪萨斯，建立了自己的阵地。1856年当堪萨斯出现两个对立政权（即奴隶主领地政府和自由移民政府）的时候，皮尔斯公然站在南部奴隶主一边，袒护奴隶主政府，并指责自由移民政府为背叛行为，因而进一步助长了奴隶主的反动气焰，酿成堪萨斯流血事件，揭开了内战的序幕。这就充分暴露了皮尔斯作为奴隶主利益维护者的庐山真面目。美国史学家布鲁斯指出：“皮尔斯总统的民主党政府给这个法案以充分的支持……，在接受这个法案的原则中……民主党的领导使自己和南方（奴隶主）的事业结合在一起”^⑳。

皮尔斯政府“在对外政策上，也同在对内政策上一样，奴隶主的利益成为指路的星辰”，“向外武装扩展奴隶制度已经成为国家政策的直言不讳的目的”^㉑。皮尔斯在就职演说中，公开声称其政府无意回避扩展领土问题。他直截了当地派一些积极的扩张主义分子到最重要的外交岗位上去。詹姆斯·布坎南被任命为驻英公使，约翰·梅森被派为驻法公使，皮埃尔·苏莱为驻西班牙公使。正是这三个人，在1854年宣布了臭名远扬的“奥斯坦德宣言”，建议侵占属于西班牙的古巴岛，为奴隶制扩大地盘。美国外交史学家贝米斯指出：“奥斯坦德宣言”是“奴隶制和外交结合在一起的赤裸裸的暴露”^㉒。由于皮尔斯对南部奴隶主言听计从，所以，“北方人指责他充当了南方人的傀儡”^㉓。民主党政府所以特别富于侵略性与奴隶主势力控制

了该党密切相关。美国的奴隶制度是个特殊制度，既具有古代奴隶制的残酷性，又具有资本主义的贪婪性，它巴不得把西部全部土地及周围的一些国家都纳入奴隶制的范围之内。

布坎南总统上台后完全继承了皮尔斯总统的衣钵，在内外政策上忠实地为奴隶主效劳。他曾经当过波尔克政府的国务卿和皮尔斯任内的驻英公使，是老牌的奴隶制扩张主义者。马克思所说的“一个北部的候选人担保联邦将在古巴为奴隶主征服或购买新领土，以此买得了总统职位”^②的人正是他。他事先与最高法院法官密谋策划，制定了德雷德·斯科特判决书的内容，并在1857年3月4日就职演说中号召人们“不管它是什么性质的判决”都要欣然接受^③。这个判决使奴隶制进一步在全国范围内合法化，“使共和国现在和将来的一切领地从培植自由州的地方变成培植奴隶制的地方”^④。布坎南对反抗奴隶制的人恨之入骨，他斥责美国人民的优秀儿子约翰·布朗发动的起义为“暴行”^⑤。在他任内，这位废奴英雄被处于残酷的绞刑。布坎南政府象皮尔斯政权一样，继续支持堪萨斯的奴隶主政权，并将奴隶主们炮制的勒孔普顿宪法提交国会。布坎南还在参议院攻击1842年制定的韦伯斯特—阿什伯顿条约中关于取缔奴隶贸易的条款（美国历届民主党政府从未认真执行过），“以至直到1860年止，奴隶贸易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加猖獗”^⑥。凡此种种，充分表明“詹姆斯·布坎南总统是南部种植园主的另一个傀儡”^⑦。

纵观内战前几十年的美国史，我们可以看到，奴隶制就象幽灵一样伴随着民主党。它不仅渗透到国会、最高法院，尤其是渗透到联邦政府，使联邦政府的政策从民主党上台时起就打上奴隶制的烙印，越到后来越严重，终于使民主党从主要是西部农民和南部种植园主的政治联盟演变为奴隶主百依百顺的工具。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奴隶主集团同北部民主党联盟，有加无已的滥用联邦，可以说是本世纪开始以来美国历史的一般公式。奴隶主通过接二连三的侵占行动把联邦愈来愈变成他们的奴隶”^⑧。

民主党的分化和衰落

民主党刚成立时似乎“是一个超越地区界线、经济界线和宗教界线的联盟”^⑨。但是，这样一个派系林立、经济利益各不相同甚至对立的阶级或阶层集合在一起，不过是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由于这个联盟“过于庞杂，以致它不可能是稳定的”，“杰克逊在南部和西部压倒一切的声望，掩盖了他的追随者存在的深刻分歧。”^⑩经济不满，地区冲突可以成为组成联盟的动力，也可能转化为互相倾轧和彼此分离的因素。随着政治风云的变幻和联盟内各派势力的消长，必然会发生分化和瓦解。

在美国近代史上，民主党的分化大致有三次，其时间约与它发展和演变的三个阶段同步。

第一次分化出现在30年代至40年代初期。当时，杰克逊向银行开战和他所采取的一些其他经济政策，如货币政策和关税政策，使大批领导人和富有的选民退出了民主党^⑪。他那种转移存款的做法^⑫，则触怒了南部多数选民；1832年杰克逊对南卡罗来纳所采取的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虽然得到北方大多数人的称赞，但也引起不少南部人的恐惧和反感。所有这些分歧和不满，使民主党内部矛盾日趋严重，逐渐形成了杰尔逊的反对派。他们同北部信仰约翰·昆西·亚当斯和亨利·克莱的人，同那些赞成银行、保护关税政策和内部政策的人一起，共同组成反对派的核心，并最终导致辉格党的产生。1834年建立的辉格党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民主党分化的结果。组成辉格党的主要有以下几种人：在杰克逊反对合众国银行斗争中受损害的银行系统的民主党人；在废除国会法令问题上被杰克逊的立场激怒了的老牌州权

主义者；新英兰和中部各州工商业者和金融资产阶级以及同他们有联系的部分奴隶主。他们所以称为辉格党，是要暗示象18世纪70年代英国辉格党人反对英王乔治一样，19世纪30年代的美国辉格党人是在反对“安德鲁国王”的专制而斗争。辉格党的建立及其势力的逐步增长，无疑削弱了民主党势力，40年代以后，辉格党成为民主党的强有力的竞争者，并最终使它在1840年总统竞选中失去了白宫宝座^⑤。

民主党的第二次分化发生在40年代中期以后。主要是围绕美国侵墨战争得来的西部大片领土如何处置问题引起的。

早在“前总统马丁·范布伦靠边，从而有利于田纳西州奴隶主詹姆斯·波尔克时，民主党内的废奴派便已开始分化。民主党内不满情绪导致两个不同的派别，即亲政府的保守派和反政府的“烧仓派”^⑥的出现。

1846年，在众议院讨论关于为侵墨战争拨款的法案的时候，分裂进一步加剧了。当时，宾夕法尼亚州民主党众议员戴维·威尔莫特提出了一个补充法案(附件)。它规定，不许在从墨西哥得来的新领土上推行奴隶制。这个“附件”的提出不仅得到北方广大工人、农民、废奴派和自由党^⑦的热烈拥护，也受到北方一部分民主党人和工业资产阶级的支持。“附件”在众议院得到顺利通过，但是在参议院却被打入冷宫。正是“在对待拨款法案问题上，国会中的民主党人完全分裂了……，北部52名议员投赞成票，而50名南部议员和4名北方议员却反对这一法案”^⑧。1847年，民主党内烧仓派再度提出这个“附件”时，民主党以南北分界进一步发生分化。本来在民主党成立之初，西北地区广大农民是和南部奴隶主结成联盟，共同反对东部资本势力的。这是他们团结在民主党内的主要原因。但是到40年代，两者在新获得的西部土地问题上发生根本分歧。于是，在民主党内便形成了反映西北地区农民利益的烧仓派。民主党的这次分化，直接导致一个新的政党——自由土壤党的产生。最早起来筹建自由土壤党的不是别人，正是民主党内造反出来的反奴隶制分子——烧仓派。他们于1848年6月在纽约州尤蒂卡召开大会，宣布成立自由土壤党，并以“威尔莫特附件”作为其纲领。1848年8月在布法罗举行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全国性的自由土壤党。该党的主要要求是：反对把奴隶制扩展到西部土地上去；实行宅地法，把西部土地无偿分配给移民。他们提出响亮的口号：“自由土地、自由言论、自由劳动和自由的人”。参加自由土壤党的人主要是西北地区的农民、自由党人和辉格党内反奴隶制分子。《美国政党的演变》一书的作者罗宾逊称侵墨“战争结果成为潘多拉盒子”^⑨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本来波尔克们是希望通过战争来扩大奴隶制，以巩固和扩大民主党的地盘的。可是，事与愿违，由于在西部领土问题上所引起的党内严重分裂，导致它在1848年总统竞选中再次丢掉了白宫。

民主党的第三次分化发生在50年代。本来到1852年，民主党曾一度恢复了它多数党的地位。由于1850年妥协案的制定，许多烧仓派重新回到了党内。民主党在富兰克林·皮尔斯的领导下，团结了党内大多数成员，暂时统一了南北两派，并吸引了大量新选民，连续把两个候选人(皮尔斯和布坎南)推上总统宝座。可是，这不过是暂时的表面现象。50年代美国社会政治和经济形势的发展，不能不强裂地冲击着民主党。当时，北方废奴运动正在蓬勃发展；主张用暴力推翻奴隶制的思想也逐步深入人心；1852年斯托夫人的废奴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刚问世，就受到人民热烈欢迎，一时成为畅销书；1854年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的通过及由此引起的堪萨斯内战，进一步把美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摆在美国人民面前。特别是50年代以后，北方的资本主义有了巨大的发展。在这10年中，美国工业产值第一次接近农业产值。1860年，美国工业发展水平已跃居世界第四位。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和工业资产阶级力量

的壮大，他们与奴隶主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工业资产阶级对奴隶主通过民主党控制政权愈加不满，迫切要求改变现状，掌握国家权力。与此同时，民主党的社会基础却发生严重动摇。随着50年代北方工业和西部农业大发展，随着铁路交通的发达，原来从事转运及办理南方棉花出口业务的北方大商人、大船主，开始越来越多地从事运销和转卖北方工农业产品。这样一来，东北部工业资产阶级与从事转卖的大商人、大船主及西北部农民之间的联系日益加强，而南部奴隶主与西部农民和上述大商人、大船主之间的经济联系则大大削弱了。

奴隶制问题的尖锐化和上述各种事态的发展，引起了国内各阶级和政党的激烈分化和改组。民主党因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在内部出现了尖锐的对立。北部民主党首领斯蒂芬·道格拉斯借口该法案违背他过去提出的“人民主权原则”而公开反对它。后来，民主党内不同意该法案的人组成了反内布拉斯加同盟。这时辉格党也因奴隶制问题发生分化。北部反对奴隶制的人正在酝酿成立新党；国会中的民主党人亦发生严重分裂。斯托夫人把50年代美国国内形势比喻为大地震的前夜。

正是在这种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形势下，1854年，一个新的政党—共和党在美国政坛出现了。最初它只是威斯康星州的一个小团体，但像星火燎原一样，很快便布满美国北方大地。到1855年末，北方每个自由州都成立了共和党组织。1856年2月，反奴隶制的人会师匹兹堡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全国性的政党。参加共和党的有自由党、自由土壤党、民主党内反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的人和正在瓦解中的辉格党北方派。民主党内的反奴隶制的人成为共和党的最积极的成员。

共和党实质上是以反奴隶制为目标的北部工业资产阶级、工人、农民和黑人的广泛联盟。共和党的异军突起及其势力的增长，加强了资产阶级领导的反奴隶制的统一战线，大大改变了美国政治力量的对比。许多人都聚集在共和党的旗帜下。一些著名的民主党人，如查尔斯·萨姆纳、萨蒙·蔡斯、戴维·威尔莫特、约翰·弗里蒙特和范布伦派的一些人，他们感到在民主党内已无法遏制蓄奴势力，也都纷纷转向共和党。这些人的倒戈相向，大大加速了民主党走向瓦解的进程。

1860年4月，在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召开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民主党公开分裂的时刻到来了。在代表大会上，北方民主党人坚持道格拉斯的“人民主权原则”，并提出了反映这一原则的纲领。南部民主党人则坚决反对，他们提出了一个完全代表南部奴隶主利益的纲领。当大会通过了北方民主党人提出的纲领时，南方民主党人退出大会。北方民主党人在休会以后在巴尔的摩复会，推举道格拉斯为总统候选人。南方民主党人另外召开了自己的代表大会，通过了自己的纲领，推举布雷肯里奇为总统候选人。于是，便出现了南、北两个民主党。它们各有自己的纲领和候选人。民主党正式一分为二。由于民主党选票的分散，在当年11月的总统大选中，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亚伯拉罕·林肯当选，民主党又一次被撵出白宫。共和党的胜利“是民主党阵营内的分裂所促成的”^④。

1861年4月，由于南方奴隶主集团悍然发动叛乱，炮击联邦要塞萨姆特，南北战争终于爆发了。战争爆发后，北方民主党又分裂为主战派和主和派。主和派同南部民主党站在一起，死心塌地为奴隶主效劳。主战派一般都站在共和党的旗帜下，支持林肯政府的政策。在内战过程中，奴隶主势力遭到惨败。民主党由于代表落后腐朽的奴隶制度，逆历史潮流而动，在人民群众中威信扫地，一蹶不振。重建时期，南北两个民主党(主战派除外)再度合流，妄图召唤奴隶制度魂兮归来，实现奴隶主势力的复辟，但终究阻挡不住历史车轮的前进。美国人民通过四年浴血奋战和重建时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终于把奴隶制度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至此，作为奴隶主工具的民主党也就寿终正寝了。

民主党从建立到瓦解，三起三落，几度沉浮。如果说第一次分裂主要是内部派系争权所引起的话，那么，第二、三次分裂完全是奴隶制问题造成的。“1860—1884年，是民主党历史上最阴暗的年代，在这个时期中，民主党人一次也未被选为总统。”^④在国会中，民主党绝大多数时间也失去多数党的地位。这完全是它自己和奴隶制绑在一起的结果。美国著名史学家亨利·斯蒂尔·康马杰十分中肯地指出，民主党是“奴隶制拖垮的”^⑤。

1884年，克利夫兰上台，民主党东山再起。但这时的民主党已不是原来意义的民主党了。无论在其成员的阶级成份上，还是在它的纲领内容上，都已全面更新。随着垄断的产生，民主党成了垄断资产阶级的工具，它和共和党一起，同为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统治国家的两只手。至此，美国现代意义的资产阶级两党制正式形成。美国政党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注 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 小阿瑟·施莱辛格主编：《美国民主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73、82、105、105、112、115、144、73、86、117、146页。

②⑨ 福斯特：《美国历史中的黑人》，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252、190页。

③⑥ 谢沃斯基扬诺夫主编：《美国近代史纲》上册，三联书店1977年版，第325—326页。

④⑦⑱ 李剑鸣：《也谈美国内战前的几次妥协》，《世界历史》1987年第2期，第117页。

⑤⑳ 查尔斯·比尔德、玛丽·比尔德：《美国文明的兴起》，纽约1927年版第2卷，第50、17—18页。

⑧ 查尔斯·比尔德：《美国的党争》，纽约1928年版，第62页。

⑨⑬⑱㉑ 弗兰克·弗雷德：《美国历届总统小传》，新华出版社1982年版，第45、62、76、76页。

⑮ 菲利普·方纳：《道格拉斯的生平和著作》第1卷，纽约1956年版，第292页。

⑳ 哈罗德·布鲁斯：《美国的政党和政治》，纽约1972年版，第74页。

㉑⑲⑳㉑⑩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第351—352、324、351、323、355页。

㉒⑳ 塞缪尔·F·贝米斯：《美国外交史》，纽约1965年版，第322、333页。

㉓ 加尔文·林顿编：《美国200年大事记》，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169页。

⑳ 1832年7月，杰克逊对继续给予银行营业执照的否决，激怒了民主党内的某些人；1835年4月和1836年1月，杰克逊命令存放联邦资金的银行不得发行和接受10美元以下的纸币；1836年7月又发布硬币流通法，除硬币外，禁止以任何其他东西购买公共土地。所有这些经济政策引起民主党内许多人不满，促使他们纷纷退党。

㉑ 1833年9月，杰克逊宣布联邦岁入不再存入合众国银行，而存入经过选择的州银行中，后者被人称为“宠儿银行”。

㉒ 辉格党与民主党相比，没有进步与保守之分，它和民主党的斗争不过是剥削阶级争夺国家统治权的斗争。两个政党都是北部工业资本家同南部奴隶主妥协的联盟。

㉓ 烧仓派(Barnburners)，是1834年纽约州民主党中出现的以范布伦为首的反对扩展奴隶制的派别，其中包括不少西部农民。由于态度坚决，其反对者因此称呼他们。据传，有一个荷兰农民，为了消灭老鼠，不惜烧掉自己的谷仓。

㉔ 1840年成立的一个主张废除奴隶制的政党。

㉕ 潘多拉是主神宙斯命火神用粘土制成的人类第一个女性。据希腊神话，宙斯命潘多拉带着一个盒子下凡，潘多拉私自打开了盒子，于是里面的疾病、罪恶和灾难全跑出来散布到世上。后来人们用“潘多拉盒子”比喻灾难的根源。参见埃德加·罗宾逊：《美国政党的演变》，纽约1924年版，第128页。

㉖ 《交流》杂志，1987年第1期，第80页。

(本文责任编辑 吴友法)